

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陈 露

(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 面对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诸多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深入社会结构之中, 坚持问题导向, 主动回应挑战, 在批判分析社会思潮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 在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集体意识中不断强化价值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要弥合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分歧隔阂, 促成社会价值共识, 更要在资本物化社会中深入日常生活世界, 关注人自身的生存, “解蔽”道德意义, 帮助实现人向人本质的回归, 进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价值引领, 促进社会整合, 实现道德教化等功能, 彰显其服务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社会结构转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认同; 价值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 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3)01-0095-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3.01.016

Th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CHEN Lu

(School of Marx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China)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embed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dhere to problem-orientation, actively meet challenges,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by criticizing and analyzing social thoughts, strengthen the value identification by carrying forward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derived from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bridging about division of social interest groups by promoting to form value consensus. In addition, deepening into the daily activities in the commercialized society, focusing on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recovering” the moral significance for people to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oneself. Therefore, the miss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o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of mainstream values, to promot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ociety, and to achieve moral enlightenment, demonstrating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people-oriented values and society-serving actions.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ist core values; value identification; value consens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20-02-20

基金项目: 安徽省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教研项目 (2019szjy039); 安徽省阜阳市社科规划课题 (FSK2022028); 阜阳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专项重点课题 (2021SZGZ01ZD)

作者简介: 陈 露, 女, 专职思政课教师。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E-mail: 1107481512@qq.com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是解开社会之谜的重要工具,主张从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出发,考察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带着问题去思考和解决问题^[1]。这为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分析框架,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过程、存在方式以及价值功能等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因此,需要探寻社会结构转型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即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脉络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外部环境变化,分析在复杂社会变迁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应对路径,从而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结构转型中道德教化、价值引领以及社会整合等潜在功能。

一、我国三次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回顾及特点分析

(一) 三次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回顾

一般而言,社会变迁表现为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体制变化的双重交织。社会体制即经济体制转轨,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由此触发社会结构转型,二者共同构成社会变迁现象的发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出现过的三次重大社会结构转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以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成员由此进入了以身份为标识的单位制社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二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确立,开始从单位制社会向后单位制社会过渡,个人能力和经济实力取代了单位制下的身份政治因素成为划分阶层的主导因素,逐步实现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的转换。三是近年来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引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并带来上层建筑的变迁。正如卡斯特所言:“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同时,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既不是单位制社会的身份地位,也不是后单位社会中受市场经济支配下的利益关系,而是基于互联网信息节点而形成的新的身份关联。因此,社会体制变革触发的社会结构转型,并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助推之下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具体表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上,即从单位制社会向后单位社

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而网络社会的出现使得陌生人社会开始向后熟人社会过渡。这一过程中,社会形态则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到网络社会的转变。

(二) 三次社会结构转型的特点分析

1. 单位制社会到后单位制社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度逐渐瓦解,带来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间关系的颠覆性转变,政府权力弱化,社会自主性逐渐增强,过去高度集中、相对同质的社会结构逐渐转变为相对分散、异质多元的社会结构,实现了单位社会到后单位社会的转变,这也正是社会体制革新触发的社会结构重组的体现。首先,传统“单位制社会”是由上向下的三层纵向联结控制的机构,个人依赖单位,单位依赖政府,纵向高度合一,个人终身固定就业与单位内部自足性的福利保障制度,使得个人在单位之外的社会活动较少,成员间的生活空间相对稳定,造成整个社会的封闭状态。其次,后单位社会则指由于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而使得社会联结关系实现了从“国家—单位—个人”到“国家—个人”的过渡。此外,户籍制度改革、单位体制解构以及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制度的逐渐推行,均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束缚社会流动的体制阻力,使得社会上升的流动空间增大,社会整体的活力增强,而原本整齐划一的生存状态和政策制度确定身份地位的格局也被打破,经济实力和个人的能力成为决定个体社会地位的主导因素。

2. 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费孝通提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传统社会中的制度规则嵌于人与土地以及村庄的关系之中,因而中国社会变迁则应以乡土社会转型为支撑点。乡土社会中农民因耕种被固定在土地上,人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村庄中,而村庄带有某种“共同体”色彩,内部共享统一的价值规则和文化传统,人际关系也是基于血缘亲疏和日常交往形成的稳定联系,这种血缘情谊作为无形的道德力量,又反向监督调节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因此,“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是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的亲情社会。循着这种思路,单位制度和住房限定,将人们的社会交往限制在单位内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单位成员工作领域与生活领域在空间上的交叉重叠。而户籍及福利保障制

度所形成的合力进一步加剧了单位社会的封闭性，单位成员的关系日渐密切，从而具有传统村落的共同体色彩。因此，单位制社会仍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而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住房商品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单位成员走出单位大院，通过市场购房而分散居住，打破了这种封闭的熟人环境。同时，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村庄制度也发生转型，农民与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减弱，不同代际的农民“离土出村”，开始向城市自由迁徙和流动，个体从熟人社会下血缘关系的羁绊和地域的限制中挣脱出来，自主独立的个人成为“无门无窗的单子”，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光怪陆离的城市“利维坦”之中，由此形成了基于货币和契约为核心纽带的陌生人社会。而这种新的群体关系，它既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发展阶段，人们似乎再也找不到“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发之时起，就休戚相关、同甘共苦的感觉”^[2-3]。

3. 陌生人社会到后熟人社会

伴着信息通信技术飞速进步，出现了网络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形态，卡斯特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4]。卡斯特将“网络社会”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态，即以网络化逻辑为基础所建构的新的社会结构形式，这里“网络”不仅指大数据互联网，还意味着许多节点组成社会关系网，将任何地方的数字化设备连接起来并重新结合，由此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与逻辑存在，而且这种以网络节点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系统。如果说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联结纽带是血缘关系或地域远近，而陌生人社会中个人的原子化流动，造成每个人仿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片孤舟，那么网络社会则将原子化的个人通过彼此间的网络节点再次联结起来，进入了所谓的后熟人社会。“后熟人社会”是与“熟人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以物联网为平台，依托大数据建立起来的能够凝聚陌生人为一体的社会。“后”有三层含义：一是从时间上看，后熟人社会发生在熟人社会之后，是属于陌生人社会的一种存在形式；二是从凝聚纽带上看，后熟人社会是由后天的网络为纽带凝聚起来的社会，这种后发的联结纽带不同于先天的血缘和地缘纽带；三是从性质上看，后熟人社会是虚拟性质的社会，是围绕着

公众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焦点事件被临时建构起来的社会^[5]。换言之，网络社会来临后，原子化的个人犹如独立的网络节点，经历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过程，从而在虚拟空间中编织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网状的社会关系网。由此，社会结构由“阶层状”转变为“网格状”，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再次变革和社会关系的重构。

二、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社会环境由封闭到开放造成多元社会思潮激荡

社会思潮是以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为基础，是在特定时期内对特定社会群体中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表征为某种社会文化意识，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回顾我国社会结构的三次转型，随着单位制社会逐渐解体，个人从单位体制和地域户籍限制中解放出来，个体原子化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多元社会思潮的产生奠定了社会主体基础和思想条件，而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则构成价值观念多元的内在动力。加之，网络社会的形成不仅为多元社会思潮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孕育场所和便捷的传播通道，还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更加隐蔽的渠道。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可以在网络环境中找到栖息之所，多元价值观念的激荡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价值分歧，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使得社会群体之间因缺乏认同而难以形成共识，造成群体分化甚至群体极化；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掌握网络信息技术的核心优势，并借助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和跨越时空限制的特性，轻而易举地将“粉饰包装”后的西方普世价值理念和带有误导性的不实言论渗透到我国网络环境中，蓄意攻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激化阶层对立情绪，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稳定。因此，面临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双重挑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输出及构建的重要载体，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整合多元社会思潮的主导地位，有效防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主动回应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二）社会管理体制松动带来的社会原子化动向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活确定性、

安全感以及价值归属感均来源于共同体生活中的社会认同。随着单位制社会中整体性社会联结机制的逐步瓦解,社会人际关系逐渐疏离,社会价值认同降低,失去单位庇护的个体之间尚未成功实现有效的社会联结,并在社会价值和精神上处于真空状态,造成了社会原子化趋势,而社会原子化并非一般的社会关系疏离,是指在社会重大转型变迁时期,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总体性危机^[6]。这种个体的孤独游离的状态不仅是社会转型期的衍生物,也是对社会整合状态的否定,但同时又构成了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起点。因为社会成员既然难以将自己与共同体有效关联起来,必然导致个人利益至上主义盛行,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旁落,纯粹的工具性思维使得社会人际关系变成冰冷的金钱物质关系,加剧了价值认同的缺失和社会成员内部的分裂,所以“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也必须把自己的某些活动集中到解决涂尔干的整合问题上,即避免陷入失范”^[7]。换言之,极端的社会原子化则暗含新的社会整合问题,这种整合不是依靠强制性制度而是依赖集体意识的有机团结,而集体意识则指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是社会成员间形成统一价值认同的基本前提。可见,在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我国的社会联结纽带经历了由乡土社会的血缘地域认同,到单位制社会内部的强制性认同,再到当前价值认同缺失的过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当务之急便是重建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联,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集体意识,构建共同体联结的价值认同基础。

(三) 市场经济逻辑驱动下的社会利益群体分化

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不可避免地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经济水平相差无几的状态,加速了社会群体分化。布劳把社会结构定义为“一定的人按照决定异质性与不平等程度的类别参数和等级参数而形成的分布与分化程度”,即指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以及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身份^[8]。换言之,社会成员对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的占有及其分布的离散趋势构成了社会具象结构,而这些离散结构所形成的阶级、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分化现象则表现为社会群体分化。一方面,单位制度社会由行政级别、身份等级等标准的群体划分演变为现代由经济水平、

自身能力主导的群体划分,而市场经济又进一步拉开了群体间差距;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原子化趋势和网络社会的重新联结,独立的个体根据对事情的态度、想法而聚集成新的网络群体,它是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流而结成的内部具有统一认同的缺场群体,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的特点。由此可见,我国的群体分化经历了单一的身份等级分化向经济利益和文化认同双重分化交织的演变。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经济利益分化加剧、收入差距过大则导致群体间彼此的价值观念对立和分歧日益突显,而价值认同驱动的群体分化则进一步导致社会共识的割裂和社会价值观念碎片化,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弥漫,甚至群体性事件爆发,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群体关系的融洽程度。有鉴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致力于强化群体间的价值认同,促成价值共识,填补社会群体之间的沟壑,消除群体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帮助引导社会群体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安抚因经济收入差距而带来的心理落差,减少社会戾气,营造健康平和的社会心理与和谐理性的社会氛围。

(四) 资本物化逻辑全面裹挟下的社会“道德遮蔽”

对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滑坡和道德失范现象,有学者认为是社会变迁中结构断裂与现代制度规范的缺席即传统价值观念解构,新的伦理道德尚未建立而导致的“道德真空”^[9]。这种观点是传统二元对立的片面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具有“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即道德伦理之间存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野,认为社会变迁的断裂时空中造成了“道德真空”,但实际上道德从未“空场”或“缺场”,社会之所以组成社会,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机械组成和内在情感联系的共同作用,形成具有道德的实体,并且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不断生成的,并不存在绝对的断裂。文化观念和道德伦理具有传承性,并不能泾渭分明地厘清传统道德和现代道德之间的内涵差异,所谓“传统”“现代”只是单纯划分了道德发展的时间阶段,而道德本身是一脉相承、创造性发展的。因此,道德永远是“在者”而非“他者”,只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被“遮蔽”而成为“忘在”,其根源并非是市场机制,而是“商品、市场和货币,以它无可替代的逻辑紧紧抓住了日常生活”^[10]。资本逻辑全面泛滥于日常生活领域,使得人的生存状态被物化逻辑所宰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日益成为奴役人、支配人的外在异

己力量，而物质的丰盛与精神的荒芜必然引发人自身的意义危机，人的主体性被物的客体性渗透，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僭越和遮蔽，人们淡忘了对价值意义的追求，放弃了批判反思的能力，太驰骛于外界而难以眷顾自身的心灵世界，造成意义世界的迷失、道德伦理的遮蔽、信仰的沦丧以及情感的冷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资本逻辑全面渗透造成的意义危机和道德遮蔽中，重返日常生活世界，与异化为“迷途羔羊”的民众深度相遇，唤醒人们内心的道德自律，重燃人们对自身生存意义和崇高理想的追求，重新发挥道德伦理对社会行为的约束和引导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解困路径

（一）批判分析社会思潮，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

社会思潮多元不仅是物质利益分化在思想层面的必然表现，更是社会群体分化的思想镜像，不同利益群体间存在的心理隔阂和观念分歧，以及网络社会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被被动回应社会思潮，而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批判精神来回应社会思潮，不仅要对其进行准确分析，更要在同化整合社会思潮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首先，钻研“磨剑”，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理论掌握群众才能获得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而理论掌握群众的前提便是理论与与时俱进的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还要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提升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拉近理论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社会思潮中的纠偏作用以及在不同群体间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其次，知己知彼，科学地分析批判社会思潮。一方面，要深入分析社会思潮形成和流变的社会基础，把握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厘清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重视社会思潮背后的利益分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前提，秉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批判分析社会思潮；另一方面，真理越辩越明，主流意识形态需要与不同

声音展开对话交锋，才能在辩驳明晰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提升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主导力，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从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最后，主动“亮剑”，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主流意识形态以充分的理论自信去挑战社会思潮，彰显自身理论的威力和话语的引导力，充分运用各种线上线下的宣传载体，针锋相对地揭示各类社会思潮存在的局限与问题，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建设，开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将主流意识形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日常生活，从而弱化各类多元思潮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总之，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是整合多元社会思潮的关键，只有将多元社会思潮紧紧凝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周围，才能形成众星拱月的一主多元的意识形态格局。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载体，更要发挥其在引领整合多元社会思潮的功能价值。

（二）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集体意识，强化价值认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个体逐渐专注自身利益而忽略社会所赋予的责任义务；同时，个体独立的价值选择而产生多元的价值观念，会造成集体意识的日渐衰落和社会价值认同的消弭，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集体意识，防止价值共识的旁落，避免社会极端分化。第一，明确集体意识的核心要义，深刻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不仅要高度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时代化、大众化、生活化解读，释放“24字”的丰富内涵，还要对核心价值观进行解码转译，实现其由刚性话语向柔性话语、政治话语向生活话语、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的有效转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刚柔并济的话语呈现方式走进民众的视野之中，提升其理论魅力和群众说服力，这是培育社会认同的基础环节。第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寻找价值认同的同质性因素。理论的实现程度往往取决于理论满足需要的程度，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不仅在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还依赖于个体利益的合理倾向对增进价值认同的推动作用，与社会个体对理论的共鸣程度直接相关，个体只有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接受之后才能外化为积极的行动自觉，这是培育社会认同的关键环节。因此，增强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成员间的认可程度必然需要广泛调研和深刻分析个体心理状

态,探寻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契合点,寻找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交集,巩固个体间价值认同的同质性基础。第三,完善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机制,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价值认同。个体之间有效顺畅的沟通有利于增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个体本身具有双重性,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者,又是传播者。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机制,需要将自上而下的被动接受与自下而上的主动传播相结合,既要加强国家宣传部门、学校思政教育以及主流官方媒体的正面宣传教育,还要充分保障和疏通个体的观念表达渠道,引导个体在主动接受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外化于行,实现由接受者向传播者的转变,促进主流价值观念的二次人际传播,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潜移默化的行为交往中实现价值内化和行为外化。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社会全体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和认同,这种集体认同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

(三) 弥合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分歧隔阂,形成价值共识

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利益群体分化逐渐拉大,不同阶层和群体间心理落差加大和心理对抗明显,造成原本群体间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彼此间利益矛盾和纠纷更加频繁复杂,社会中弥漫着诸如炫富、仇富等不良心理。尤其在后熟人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通过信息节点的联结而形成大大小小的网络群族,在网络环境的开放和信息的快速传播下,某些偏激性观念在群族内部同质和外部排斥的作用下造成“信息茧房”现象,并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变得更极端,造成群体固化甚至群体极化的结果,成为引爆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隐患。正如桑斯坦指出:“毫无疑问的,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意见。持续暴露于极端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各种原来无既定想法的人因为他所见不同会各自走向极端,造成分裂的结果,或者铸成大错带来混乱。”^[11]因而,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维系社会有序运行的整合功能,通过情感整合、社会心理整合、构建利益共同体等方式消除群体之间的心理隔阂和利益矛盾,凝聚思想共识,修复因立场观念冲突导致的价值混乱和文

化裂痕。首先,民族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是不同阶层和群体间情感整合的文化纽带。思想政治教育应启发不同阶层和群体寻找彼此间的共有特质和共同情感,这种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情感不仅是其沟通协商的纽带,更是其价值共识形成的情感基础。“同根同源”的原生“交集”有利于消弭阶层和群体间的意见分歧,强化彼此间的情感联系,构建稳定统一的社会“合集”;其次,社会群体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是社会心理整合的基本前提。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说理引导、心理疏导、心理咨询等方法,帮助缓解弱势群体的失落感和无力感,启发社会成员在利益面前自我调适、自我反思,引导各类群体客观理性对待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通过交流对话的方式来有效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积极理性的社会心理和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最后,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价值共识生成的根本,而利益共同体构建不仅要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更需要正确的利益观。思想政治教育虽不能直接参与利益分配,但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人们科学认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引导不同阶层和群体形成科学正确、与时俱进的利益观,妥善协调各方利益矛盾和冲突,最大限度地消解分歧,最大范围内凝聚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共识。

(四) 深入日常生活世界,关注人自身生存,“解蔽”道德意义

资本逻辑裹挟下的道德“遮蔽”,实际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市场经济自身的趋利性使得利益关系的冰冷漠然取代了人际关系的温情脉脉,外表的物质利益“遮蔽”了内在的道德价值,人们感到“无家可归”的空虚失落和意义追寻的虚无迷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深入日常生活世界,关注人自身的生存,“解蔽”道德意义,唤醒人们内心的道德律令,恢复人们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发挥道德在约束行为和遏制欲望等方面的作用。首先,要明晰道德“解蔽”并不是单纯祛除外表的金钱关系的笼罩,更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有的道德体系,而是在恢复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以获得保持道德持续在场的生命力,而创造性转化则是建立起一种新的与现代性社会人的生存方式相适应,同时又与传统道德伦理相承接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道德体系,这样才能避免道德再次沦为“他者”而被遗忘。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根基”,在中华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积

淀之中汲取精神养分，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批判地继承传统道德的合理的精华，为现实的道德“解蔽”服务。其次，道德的创造性转化不能局限于观念文化的世界，还要深入日常生活世界，实现由抽象的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变，更好地嫁接起“道德意义—生活世界—个体世界”之间的联系。生活世界主要包括日常观念活动、交往活动和维持个体生存活动等各种实践活动，而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的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重复性倾向，即布迪厄所提出的“惯习”概念，这种“惯习”能够通过传统、习惯、经验等历史因素的固化来维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保证道德观念的延续。换言之，“惯习”便是道德发育的种子，生活世界是孕育道德价值的母体。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贴近和关注日常生活作为基础和立足，还要将道德价值与社会实践、人的“惯习”相结合，将“应然”与“实然”融会贯通，实现道德价值对日常生活的提升和超越。最后，任何精神或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现实的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深入日常生活世界，更要关注人自身的生存。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生存问题提供了理性的思维方式，引导人们在审视生存状况中捕获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智慧，在迷茫中寻找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启迪人们摆脱异化的被动状态，在对人生最高意义的寻求与探索中实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实现人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迈进。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通过唤醒人的内在道德，铸造人的灵魂，激活人的潜在价值，建构人的精神世界，净化人的思想，美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风貌，使人真正成为具有崇高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的主体。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在回溯传统文化道德之中拿到“解蔽”道德的钥匙，在深入日常生活世界中发掘道德意义积淀形成的种子，在关注人的自身价值和生存中帮助实现人向人本质的回归，这不仅推动社会结构的健康转型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社会、以人为本的行动指南的价值取向。

四、结论

毫无疑问，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与经验事实成

为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一种分析视角^[12]。它不仅是串联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发展三者间的纽带，还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潜在功能。一方面，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一系列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生存状态和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造成人们思想和心理上的震荡和混乱；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走进社会结构转型之中，着眼于社会现实问题，才能找到自身发展的针对性路径，进而不断探寻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理论生长点^[13]。因而，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分析视角，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坚持问题导向，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职责使命。

参考文献：

- [1] 陈露. 浅析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J]. 经济研究导刊, 2020(1): 1-2.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3] 卢岚. 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空间转向[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3): 52-58.
- [4]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5] 王晓丽. 大数据时代的道德监督功能的学科视野[J]. 伦理学研究, 2019(3): 32.
- [6] 田毅鹏, 吕方. 社会原子化: 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J]. 天津社会科学, 2010, 5(5): 68-73.
- [7] 马尔科姆·沃特斯. 现代社会学理论[M]. 2版.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8] 卢岚. 从触及灵魂到触动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合作之维[J]. 理论与改革, 2014(1): 137-143.
- [9] 渠敬东. 缺席与断裂: 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0] 本·海默尔. 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11]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2] 卢岚. 社会结构转型: 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一种分析框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21): 4-9.
- [13] 卢岚. 社会结构转型: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12): 35-40.

(编辑: 程爱婕)